



平等：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同社会主义思潮的共同追求与相互竞争

薛子燕

摘要：新文化运动时期，强调平等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当时三派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追求。然而它们对平等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这种追求大异其趣，造成了不同社会主义思潮间的激烈竞争。正是在这种共识与竞争交织的复杂语境中，平等观念从抽象性的价值走向了具体的历史生活实践，社会主义由外来的社会思潮具有了更多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

关键词：平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所确立的重要价值观念之一。尤其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它为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心向往之的新型社会和理想人格。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既是近代先进人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又是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平等理想认可的结果。也可以说，有关平等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促成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流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三派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享着相同的平等价值资源，一致批判专制、反抗强权、反对私有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救世方案。然而由于各自汲取的国外社会主义理论来源的差异和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导致它们对平等观念的追求大异其趣，尤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存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观点，造成不同社会主义思潮间的激烈竞争。正是在这种共识与竞争交织的复杂语境中，平等观念从抽象性的价值走向了具体的历史生活实践，社会主义由外来的社会思潮具有了更多的中国内容和中国特色。

一、个人主义与理想乌托邦：无政府主义平等观

无政府主义自 19 世纪末随西学浪潮传入中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国之前，以旅日学者的天义派和旅法学者的新世纪派为主，也包括《民报》成立以后革命派中的部分成员。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民主革命潮流的一部分，其思想主旨以反抗专制制度和封建思想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是民国建立之后至五四运动之前，以刘师复的“师复主义”为主要代表。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承担着双重启蒙任务，在反对封建思想专制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第三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以黄凌霜、区声白、郑太朴、朱谦之等为主要代表，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迎合了人们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进行否定的愿望，满足了知识分子企盼国家和个人得到解放的强烈要求，其思想矛头在针对资本主义的同时开始针对马克思主义。本文的考察对象集中于第三个阶段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行,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当时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是革命高潮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与之相适应,提倡建立具有空想性质的理想社会图景,体现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平等观,其思想主张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反对国家、政治、法律等一切社会强制力。在无政府主义看来,国家是强权产生的根源,“国家不独是资本家的保护者,并且是万恶的渊源。人性本向和平,国家要他们打仗,拼死;人类本极平等,国家要他们分成若者为奴,若者为主,若者为贵,若者为贱;人生本应自由,国家要压迫言论,出版物”^①。“自有了那国家之后,于是把地球上同样的人类,划了不知多少堆数。……于是而‘博爱’这个名词的意义,至多不能超越国界了”^②。至于政府、法律都是随国家而来,因此一并在反对之列。他们指出:“国家的作用,国家的出风头期,已经过了;要是再不废掉他,就要变成进化道上的障碍物,所以大声疾呼的打破他。”^③是否保留国家形式与政治组织,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主要分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后,应当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巩固无产阶级统治,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组织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无政府主义则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伪社会主义”,认为这种“国家革命不如无政府主义革命”^④。

其次,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奴役和专制,要求个人绝对自由,这无疑与新文化运动中个性解放的主题不谋而合。这种绝对自由的理论中包含了三种内容。一是强调个人自由。他们认为个人与国家根本对立、不可共存,追求个人的无限制自由就要反对国家政府的任何约束。他们从应然的层面指出,个人自由就是个体不受到丝毫外力的侵犯和约束,只有个体的绝对自由,社会才会进步。区声白说:“我所知道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⑤二是鼓吹意志自由。朱谦之认为,所谓个人绝对自由是一种意志自由。他将中国传统性善论和乐观主义思维方式与无政府主义相结合,强调心力的作用,含有将现实问题伦理道德化的趋势。这类自由不需要面临和解决现实中的具体社会问题,仅凭个人的道德自律性和小团体范围的劳动实践就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的进步。这种意志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追求启蒙和救国双重目标的人来说,意味着双重的满足。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它对一切现存秩序的否定和批判为传统因袭重压之下的启蒙者带来了破坏的快感;而田园式的社会改造理论为他们带来了幻想的愉悦。”^⑥三是追求自由联合。所谓自由联合,就是在推翻国家政府法律制度之后,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社会组织方式。区声白提出:“法律不过是一部分人之人要来压制他部分人之一方法,未必能够干涉恶人,有时反侵害善人,是不公道的,不平等的,所以无政府党人主张废除法律而代之以自由契约,必要共同合意才订立的。”^⑦他们一方面将现实的罪恶归结为不正当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在个人的绝对自由与社会群体平等的自由之间保持一致,设想个体能够按照互助的本能以契约的形式结成社会。这是为了避免造成社会一盘散沙的状况,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

再次,坚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经济分配原则。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主张上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都赞成生产资料和生产机关公有,他们的分歧在于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方式上。对于这种分歧,李达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作过分析。他指出,就生产组织来说,无政府主义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⑧,在不建立任何权力形式的前提下实现生产的自

①易家钺:《破坏论(一)》,载高军等:《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8~369页。

②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通信》,载《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4册,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1981年,第1页。

③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通信》,载《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4册,第1页。

④朱谦之:《革命的目的与手段》,载《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第383页。

⑤区声白:《区声白致陈独秀书》,载《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4册,第7页。

⑥孟庆澍:《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围绕〈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⑦区声白:《区声白答陈独秀书》,载《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4册,第13页。

⑧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9页。

由化；在分配方式上，无政府主义“全不调剂各人的收入，并且也没有收入不收入那种观念，只是调剂各人的消费，甚至连消费都不调节的”^①。他们幻想在推翻了剥削阶级、国家制度之后，以自由劳动创造生活，以社会互助维持进化。而在暂时无法推翻现存制度的状况下，只有通过学习与劳动、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来完善自我人格。因此，小团体的自由联合为这种活动需要创造了最适合的条件。五四运动前后，无论是“新村运动”还是“工读互助团”等组织，或者直接成为这种设想的产物，或者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而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正如当时参加过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所言：“我们理想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了一部分。”^②

无政府主义平等观的理论根基，建立在性善论的伦理基础上。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无需外力干扰就可以自然进化，人的良心是社会正义的出发点。因此，“个人底行为，就是不受外部的势力例如宗教，法律等底制限，也不致于做什么恶事的。就是虽然没有法律强迫人做工，人们还是愿意去做，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每人应取多少，人们也不致于取过所需。其外虽无法律制限，强者也不致于来欺侮弱者，智者也不致于愚弄愚者”^③。不论是教育、契约还是公意等联合，都为人的道德至善性提供了一种信誉保证，这是无政府主义扫除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形式的制度化障碍，实现全世界的自由、平等、互助、博爱的基础。如果失去这个基础，无政府主义是无法实现的。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这种性善论充分展现了儒家式的道德理想主义，从完善个人到完善社会的“至善”主题。他们对于平等的追求，都建立在对人性本善的美好设定当中。因此，从他们对经济制度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中，流露出浓厚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这种主题之下的个人主义，不完全是为了自由而自由，往往体现为一种对旧社会、旧制度的反抗和改造力量。正如区声白所说，“我所讲的自由，是指推翻了现存的制度而说，不是处于现存之制度就能够实现自由，处于各种恶制度之下，一举一动，都不能自由，所以欲得自由，就要推翻现存的制度”^④。他们正是以一种追求乌托邦的强烈愿望，使人们意识到现实社会和政治合法性的危机。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是一种空想性质的社会主义平等观。

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基尔特社会主义平等观

“基尔特”是英语“Guild”一词的音译，意思是行会，也指同业公会或自治团体，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叫做“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实行产业自治，由同业公会来掌握生产权，由国家掌握分配权，由资本家、工人、雇主等共同组成的机构来维护和平衡彼此的利益与权利，相互制约以求公平。五四运动以后，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较大的传播和影响，支持者多为研究系成员，其中以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张君勱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以《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为阵地，围绕社会主义平等的实现途径展开了一系列宣传。

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平等，只能通过改良，不能通过革命。1920年3月，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写了《社会主义商榷》一节，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⑤，但是可以无条件提倡的只能是这种主义的精神，至于它的实行方法，则要顺应本国现时的社会状况。在完全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在还没有形成像样的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⑥，以求免掉“社会革命这个险关”^⑦。同年11月，张东荪陪同罗素到内地演讲，对当时湖南的落后状况深有感触，回来以后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认为：“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

①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50页。

②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载《星期评论》第7张（第7版），1920年5月1日。

③周佛海：《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载《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4册，第41页。

④区声白：《区声白答陈独秀书》，载《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4册，第11页。

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9页。

⑥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梁启超选集》，第730页。

⑦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梁启超选集》，第730页。

到极点了……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着人的生活。”^①同年12月,张东荪在《现在与将来》一文中提出,中国由于没有经历工业革命,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缺乏现代工商业,导致社会普遍存在四种弊病,即“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和“外力病”,在这四者当中,当务之急是治愈“贫乏病”^②。张东荪将此文寄给梁启超,梁启超据此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进一步发挥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张。概括而言,基尔特社会主义平等观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强调发展实业,采纳“经济优先政治”的社会发展方案。张东荪指出:“实业发展不论何种方法,总是增加富力及于一班人民。虽其分配的程度不同,然不能说只有资本家得利而贫民丝毫无所增。”^③在他们看来,发展实业虽然可能造成中国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但它不是构成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在于“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④。按照“经济优先政治”的发展原则,张东荪提出发展实业的两种途径:其一,既然中国不具备制度革命的条件,经济匮乏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幼稚”,而“产业幼稚”是人民普遍智识程度不高造成的。因此,他将发展经济和实业的目标落实到发展教育、提高知识上。他说:“现在各国所处的境地是选择制度的境地;所以有生产国有说,无产者专政说,全国工行说,地方工行说等。中国今天尚没有到这个境地,用不着做具体的规划,但要提倡一种社会主义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先使中国人的精神革了命再说。”^⑤而所谓“救济贫乏病的可能方法”^⑥,则主要是指:“普通的文化事业”,即授人以知识、打破旧思想旧习惯、陶养人格;“广义的教育事业”,即学校教育;“切实的研究”,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彻底研究;“协社的实行”,即建立各种合作组织,特别是行业公会组织^⑦。其二,在无法阻挡国外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中国实业的开发,只能够暂时借助其势力,因而他们将发展实业的努力寄希望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绅商阶级。绅商阶级是指向资产阶级转化中的地主和传统商人。张东荪指出:“外国势力一来,中国自己的企业亦必乘势而蜂起。到那时,外国的势力便不啻给中国财阀以保障和后盾,则末路的军阀便无法相抗了。我预料新银行团必成,铁路统一必成,这便是外国势力助中国实业家以打军阀。”^⑧

其次,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如何实行社会主义的看法上存在分歧。分歧的关键性问题的在于:中国有没有无产阶级,如果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否具备了自觉的阶级意识来实行社会主义。在张东荪看来,中国由于产业不发达,除了个别地区有工厂和工人以外,大部分地区是能力低下的劳动者,不存在自觉的无产阶级。他说:“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⑨梁启超也持相同看法,他指出:“今通行‘劳动阶级’一语,本含广、狭二义。广义的解释,自然凡农民及散工悉含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拥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狭义的劳动者未能成为阶级,故谓无阶级也。”^⑩他们共同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步骤应该是,利用现存的绅商阶级与资本家合作发展产业,像西方资本主义一样,在资产阶级得到壮大的同时,无产阶级发生自觉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对抗,如此才具备社会主义发生的条件。因此梁启超指出:“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够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⑪

再次,从阶级问题的分析出发,基尔特社会主义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论。他们

①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载《张东荪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3页。

②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张东荪卷》,第150页。

③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张东荪卷》,第155页。

④ 张东荪:《长期的忍耐》,载《张东荪卷》,第146页。

⑤ 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载《张东荪卷》,第141页。

⑥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张东荪卷》,第159页。

⑦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张东荪卷》,第158~159页。

⑧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张东荪卷》,第151页。

⑨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载《张东荪卷》,第152页。

⑩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梁启超选集》,第754页。

⑪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梁启超选集》,第748页。

认为,劳资对立要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条件,发展资本主义尽管会带来资本家掠夺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恶果,可也为当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最可行的出路。因此,资本主义是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和必要一环,因而是“极可厌憎”而又“极可欢迎”^①的。梁启超指出:“其可欢迎之点奈何?夫中国今日不能够不奖励生产事业以图救死,而生产事业,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前既言之矣;然则今后中国若有资本阶级出现,就令其掠夺行为与欧美资本家相等,或且更甚,然最少总有一部分,得丐其余沥以免死。其可欢迎者一矣。不特此也,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此其可欢迎者二矣。”^②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增加富力还是阶级自觉,“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③。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平等观,是保障自由而指向平等的,主要有两大特点。其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看,基尔特社会主义立足国情,从考察社会现实出发,而解决经济产业发展的出路则归结为提高教育和组织协社,体现了他们将现实问题的解决转化为了一个认识的知识问题。换言之,发展实业的要求是立足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但最后的解决方案则落实在了人的知识改造上。这样,改造社会现实的总问题转换成个人发展出路的个别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变为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理论认识,而不是改造社会的实践途径。张东荪曾指出:“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经济组织是不能改造的。”^④将社会改造的基础建立在思想改造的前提下,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流于理论学说,难以应对当时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根结所在。其二,从思想的主观愿望与产生的客观效果来看,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重视经济问题,即以解决社会普遍富裕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然从解决方式上看,基尔特社会主义寻求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自治和联合运动,而不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即民主专政。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张东荪明确表示:“近来鼓吹之诸新说,止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其余概为空谈。弟向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近则以为人类原理而普泛言之,固属最善,而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即以劳农而言,决不能实现。……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矣。”^⑤

从上述两方面的特点看,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方面希望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继续带动本国的实业发展;另一方面提出建立各行业与各阶级的劳资合作与自治运动,避免劳资对立形成的社会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采取调和立场。本质上,这是一种融合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平等的产物。这种理论有它的现实性,指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极其不发达,传统农业经济和人口占主要地位,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与条件非常薄弱,对当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析亦有肯定之处。他们的目的不过想超越于极端资本主义与激进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种中庸的方案。这对于受到传统中庸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总之,基尔特社会主义平等观是一种改良主义性质的平等观。

三、民主与社会平等：马克思主义平等观

马克思主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历史实践而传入中国并且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性力量。它改变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启蒙格局和思想人物阵营,成为近代知识分子选择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转变的思想武器。

当时的历史情势,面对国家危亡的局面,人们多服膺于各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而要论证社会改革方案,历史观或历史哲学才是各种社会改革方案的理论依据。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是

①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梁启超选集》,第752页。

②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梁启超选集》,第752页。

③ 张东荪:《长期的忍耐》,载《张东荪卷》,第146页。

④ 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载《张东荪卷》,第137页。

⑤ 张东荪:《答高践四书》,载《张东荪卷》,第149页。

抓住了这一问题的关键,将社会主义平等的实现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重视唯物史观中的物质因素,强调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视作社会变迁的动因,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平等观既避免了无政府主义平等观的空想性质,又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平等观的改良主张相区别,显示出鲜明的历史感和革命性。李大钊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阶级竞争、劳工联合的趋势,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①陈独秀根据唯物史观,对民主作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提出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型民主国家思想。可以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深入批判的过程,同时也是接受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转换过程。

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当时还未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便提出两种彻底的觉悟来唤醒民众:“(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②从这两种觉悟中,又提出两大宗旨:“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③由此,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前后,将民主理想与实际的民主运动联系了起来。李大钊在看待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时,强调:“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我们的 Democracy 的运动,应该愈加猛激。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 Democracy 若已获得,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 Democracy 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 Democracy 是两个东西。我们目前惟一的要求,乃在把我们中国的 Democracy 维持得住,使他有个向上进步的基础,不为世界民主的障碍就是了。”^④民主成为人们实现政治、经济和伦理的新社会理想的现实途径,这也预示着民主是要被社会主义必然超越和继承的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以阶级平等号召社会革命。191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问题,指出:“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阶级。……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⑤他将18世纪的“财产工商阶级”与20世纪的“无产劳动阶级”相对举,指出了20世纪民主制度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对民主观念赋予了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就实现新型民主的方式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师法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⑥,转向学习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0年11月,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上明确提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⑦就达到民主的途径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由主张民主主义转向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认为:“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⑧。

其次,以经济民主增进政治平等。萨托利的民主理论指出:“人们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信息占有等方面存在或小或大的差距。如果这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距过大,必然造成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与能力严重不平等,进而影响政治民主的实现。”^⑨当时中国社会,劳动者们劳作与所得之间的极不平衡,无

①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②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③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07页。

④李大钊:《〈国体与青年〉跋》,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2~373页。

⑤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39页。

⑥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121页。

⑦《共产党》第一号短言,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741页。这篇短言没有署名作者。

⑧陈独秀:《谈政治》,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56页。

⑨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第251~252页。

产者与有产者生活境况的巨大反差,人世的尊卑贵贱,社会的黑暗与光明,成为知识分子们最直接和朴素的关切。反对特权,渴望平等的诉求,使得民主有了更为真切而具体的含义。谭平山指明:“生活解放!机会平等!由空想而进于具体的,由部分而进于普遍的,这才算做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①因此,改善劳动者经济状况,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组织觉悟,成为实现经济民主的主要内容。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②第一步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③。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④。如果说第一步是讨饭吃,那么第二步则“自己做饭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锅、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⑤。他还具体补充说明:“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⑥可见,这里包含了由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政治平等的构想。

再次,以平民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李大钊在1922年的《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一文中,正式采用“平民主义”一词。他指出:“Democracy 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 Democracy 底表现。……译为‘平民主义’,较妥帖些,但为免掉弄小他的范围起见,可以直译为‘德谟克拉西’。”^⑦他采用平民主义的表达,将中国古代社会中重视“民”的价值,与现代的社会平等诉求联系起来。1923年,李大钊撰写了《平民主义》的小册子,集中表达了他对平民主义的三点主张。第一,平民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精神的风气”,“生活的大观”,“一切前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⑧。第二,平民主义是一种国家治理形式,是人民主权基础上的自我管理,“人人都是治者”^⑨。他说:“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轨范,自进以进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⑩第三,平民主义的实现依靠联邦主义。在李大钊看来,个性伸张并不意味着无限的个人自由,而是社会不压制个性,个性也不威胁社会的协调。到目前为止,只有联邦主义的民主程序能做到这一点。“‘平民主义’与‘联邦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⑪李大钊对民主价值的发掘,不仅将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还把民主当做社会主义的内在要素和必要前提。另外,他对民主内在价值的正当性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论证。他将尊重人格、自由平等视为民主的核心精神。所谓平民主义的政治,不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而为‘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⑫。李大钊已意识到,在“平民主义”为原则的新型关系结构中,不仅包含“人民”的道德属性,也不可忽视作为“公民”的法权属性。

四、马克思主义在竞争中胜出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应然层面将平等

①谭平山:《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②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26页。

③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26页。

④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26页。

⑤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27页。

⑥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27页。

⑦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载《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⑧李大钊:《平民主义》,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⑨李大钊:《平民主义》,第20~21页。

⑩李大钊:《平民主义》,第20~21页。

⑪李大钊:《平民主义》,第30~31页。

⑫李大钊:《平民主义》,第27~28页。

视为解决一切不合理现象的价值尺度,而从实然层面,又提出各自解决思想矛盾、消除社会弊病和实现平等目标的构想。这种实然层面的分歧,集中体现在采取何种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导致1920年至1921年间,三大社会主义思潮之间展开了两场著名论战。在这两场论战当中,马克思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分别进行了有力批评。

从1920年初开始,无政府主义陆续发表《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为甚么反对布尔雪维克》等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同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正式向无政府主义予以回击。此后,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上,陈独秀以《国家、政府、法律》和《劳动专政》为题,刊登了他与郑贤宗、柯庆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通信;李达在《共产党》上相继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1921年7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自己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同年8月,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开辟《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公开了与区声白的书信论辩。从论战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流于空想和不切实际的弊病进行了逐一回应与批评。首先,批评了无政府主义取消国家、政府和法律的观点。陈独秀认为,强权是一种自然力,强权之所以可恶,在于他的用法而不在强权本身。唯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国家,才可以确保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成果。在他看来,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根本解决方案,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他说:“无政府党所诅咒的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们是不应该诅咒的。……我们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①其次,批评了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联合的矛盾。陈独秀指出,要绝对的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②再次,击破了无政府主义经济生产及分配方式上的幻想。李达尖锐地指出,在生产方式上,“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行业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依赖中央的权力不可”^③。在分配方式上,无政府主义的分配其实是一种消费平等,即“消费的自由都得平等的主张”^④,这种平等是主观上的平等,听起来似乎可行,然而“非待时机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⑤。陈独秀对于这种完全理想化、自由化的经济构想,曾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经济方案根本无法应付现代工业社会的复杂问题。他说:“倘若迷信很远的将来及终极的理想社会才算彻底,而对于现在及最近的将来之改造以为不彻底不去努力,这种人只算是‘候补改造者’,可惜他来到这世界上太早了一点。”^⑥

1920年11月,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发表之后,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李达相继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底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大钊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章。同年12月1日,陈独秀将论战双方文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标题刊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其中包括陈独秀的重要文章有《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回击。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要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这一点上并不否定,问题在于,如何来增进富力,富力归多数人享有,还是归少数人垄断。陈独秀指出:“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⑦在

①陈独秀:《谈政治》,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54页。

②陈独秀:《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94页。

③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49页。

④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51页。

⑤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51页。

⑥陈独秀:《答郑贤宗》,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93页。

⑦陈独秀:《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05页。

在他看来,使中国人都过上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李大钊明确表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以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①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驳斥所谓中国不存在无产阶级,没有阶级区分,不宜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李达指出:“‘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懂社会主义的人,只说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倡社会革命。”^②他从农业和工业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构成。从农业上看,“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③。从工业上看,“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④。因此,中国目前具备阶级基础,存在劳资对立,只是缺乏阶级自觉。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从必要性来看,在中国资本主义未稳固之前,更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等资本主义的弊病流到中国并根深蒂固之后,要推翻它就不知有多大的艰难。陈独秀说:“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⑤从可能性来看,“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⑥。李大钊从经济分析入手,指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势之必然。他强调:“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⑦

正是在这两场论战的影响下,那些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和影响,从众多“主义”之中最终选择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道路,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对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取得了根本胜利。然更为深刻的含义在于,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经济生产和分配方式等问题上从此达成共识,使得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做出区分,从而为革命意识形态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由此,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深入讨论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途径和道路的过程中,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选择和最终归宿。

●作者地址:薛子燕,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xueziyan2005@126.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9&ZD069)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载《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53~354页。

②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47页。

③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47页。

④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1卷,第47~48页。

⑤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44页。

⑥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44页。

⑦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359页。